



杨孝鸿 主编

中国时尚文化史

宋元明卷

杨孝鸿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杨孝鸿 主编

中国时尚文化史

——宋元明卷

杨孝鸿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杨孝鸿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74-0332-7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文化史-中国-宋代-通俗读物②文化史-中国-元代-通俗读物③文化史-中国-明代-通俗读物 IV. ①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57112号

策 划 傅光中

责任编辑 郑丽慧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160毫米×230毫米

8.25印张 382幅图 150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录

第五章 精致生活与市井文化——两宋时尚文化史	1
第一节 礼仪之治的宋代社会	3
第二节 商业革命与城市时尚	8
第三节 私学隆盛 惠泽士人	15
第四节 文会雅集的精致生活	24
第五节 服章之美的服饰艺术	42
第六节 粗俗喧闹的市井文化	70
第六章 金戈铁马与闲云孤鹤——元代时尚文化史	87
第一节 金戈铁马的帝国时代	89
第二节 “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的都市生活	93
第三节 “四书”北传与儒学振兴	100
第四节 林泉之隐与复古思潮	107
第五节 胡汉之间的衣食艺术	127
第六节 草根品格的戏曲艺术	149
第七节 球行天下的游艺娱乐	158
第八节 “藻而不华”的瓷器艺术	162
第七章 大朝国度与竞相奢华——明代时尚文化史	167
第一节 俭朴守礼与奢靡僭越的社会变迁	169
第二节 学术的力量——心学、实学与西学	176
第三节 正统与求变的绘画艺术	188
第四节 僭礼越制的服饰艺术	210

第五节	清丽婉约的昆曲艺术	220
第六节	炊金馔玉的美食美器	226
第七节	古朴清雅的明式家具	236
第八节	狎妓之风与花榜选美	241
第九节	城市山林与中隐哲学	251

后 记	259
-----	-----

第五章

精致生活与市井文化
——两宋时尚文化史





第 节

礼仪之治的宋代社会

经过唐末五代的内乱纷争、地域割裂，北宋的统治者在南北统一之初就愈加意识到，权力的凝聚和文化的统治，对于国家的统治和治理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故而力挺儒家思想和理学思想作为官方生活与行动的一切准则。在这样的背景下，理学的出现正是迎合了将儒、佛、道三家思想贯通并探究天人合一而得以最理性化阐释的时代要求，其宗旨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安邦定国与知天达命进行辩证的统一，欲重建礼治秩序，以礼仪规范人们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及是非观念。

但唐、五代所孕育的新的因子，历经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的躁动之后，在仁宗朝终于破土而出，呈现出文化上的“丕变”，各个文化领域内均经受了震荡，展现出一种新的风貌，体现出新特征，就好像法国学者谢和耐所说的：“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①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①（法国）谢和耐：《中国社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由于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享受的追求，宋代市民心中始终暗涌着一种冲动，试图逃出传统的礼与理的束缚和压制，有意挑战传统的古制礼仪的遗风遗规，于是，在宋代的文化生活中，一个有趣而生动的奇特现象产生了。“变古”正是宋代文化的特点，如同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述，宋代的经学同样也步入了“变古”的阶段，疑古惑经表现出文人前所未有的勇气，掀起一波文化上的新思潮，使儒学得到一次更新。

宋代词人陆游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在经学上，从“理”的高度来对旧经学的怀疑和儒家经籍的重新释义，并提出新的学说。^①在文学上，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一批文人为首开始了诗文革新运动，扭转了浮靡文风，开创了一个崭新而富有生机的文学变革时代。

宋代教育的第一次兴学运动也肇始于庆历四年，此后学校的教育规模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对此《宋史·选举志一》记载道：“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至南宋时，“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②

在教育对象上，宋代打破了唐代严格的门阀贵族的限制，显示出一种平民化、普及化的趋势。科举制度上的科目开考更具开放性，限制势家子弟在科考中获得任何特殊待遇。宋代教育的兴盛同样也有力地推进了理学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风气转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之，宋代三百年的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一是完成了贯通天人古今的理性思考，二是人文精神的萌发。它体现出的是一种开阔的视野与清醒意识，其所创建的社会文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已达到了“灿烂的巅峰”。如南宋的都城临安府在当时俨然是一座世界上最大和最富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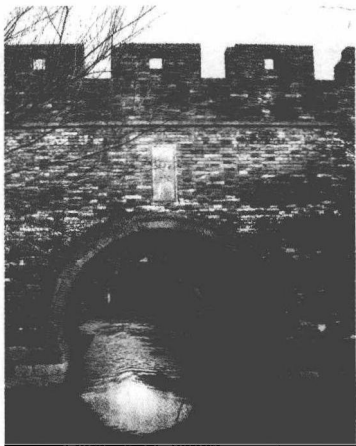
① 吴怀祺主编：《中国文化通史·两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9 年 7 月版，第 3、9、10 页。

②（宋）灌圃耐德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西湖文献集成》第 2 册《宋代史志西湖文献专集》，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版，第 44 页。

的城市，“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业……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①

随着经济的昌荣和文化的盛达，生活在宋代城市中的人们就愈加重视现实利益和精神享受的追求，松弛那根紧张、繁忙、喧闹和劳累的神经，在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

宋代都市文化充满着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与当时的商业经济有着紧密联系。宋代的两个都会城市开封和杭州，拥有着百万以上人口，商业经济十分发达，生活水平可以说处于当时的世界先进城市之列；市井细民的精神追求也格外讲究，其活跃度尤其表现在文学艺术与娱乐表演两



杭州古城门凤山门



金代早期杂剧人物。砖雕，高 32—38 厘米。山西稷山马村金墓

^①（法国）谢和耐著、马德程译：《南宋社会生活史》，台北：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2 年版，第 5 页。



苏汉臣《货郎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方面。首先是供民间艺人从事表演的场所，即瓦子勾栏，汇聚了全国各种规模不等的艺人团体。如开封大内东角楼街巷的瓦子最为热闹，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城市中大批瓦子勾栏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也促使人们通过服饰的式样来凸现时尚的追求和文化品位的显示。但宋代的主导思想却是程朱理学，洋溢着一种追求“古制”的遗风，质朴、自然是这

个时代的品格，所制定的服饰制度是以统治者界定的“天理”为核心，渐而形成一种追求古制、追求等序、自上而下、由尊至卑、由贵到贱、等级划分十分严格的衣冠服饰制度体系，总的来说是比较拘谨和保守的，式样变化不多，色彩也不比唐朝的绚丽。

饮食业方面，随着都市的繁荣有很大的发展，呈现出南北合流而花样繁多的面貌。宋代统治者也极为讲究享乐，饮食也更趋于精美奢华，饮食业也是更加的热闹。北宋后期的开封，城市里的夜市往往开到夜里三更，五更又复开张，至热闹处则通宵达旦。四方美味荟萃开封，宫中的生活饮食充斥着山珍海味，“海鳌初破壳，江柱乍离渊；宁数披绵雀，休论缩颈鳊。南珍夸钉短，北饌厌烹煎”，还有“螺蛤虾鳊白，南海琼枝，东陵玉蕊，与海物惟错”。^①

^①（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余话》，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7月版，第274页。

文学艺术方面，禅宗的影响相比唐代来说更显得突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丛林中禅师本身也多以诗说禅^①，另一方面更说明了此时的文人愈加倾心于禅宗的心性观念以及在文学上展现出自由无羁的思想，通过借用禅的比喻以构成“绝妙好词”，并由此导致了文学诗风的转变。

作为北宋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其“山林者之乐”的观点，以及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提倡的林泉之志，自然加剧了文人原本就向往自然、介入自然、融于自然的浓厚兴趣，并以此来达到在尘世喧哗中寄托性灵。于是乎那些能起着“卧游”作用的山水画更受到文人的青睐，那些能标榜文人士大夫理想人格的绘画题材同样也渐受欢迎，种种现象强烈反映出文人审美意识与情趣的自觉化及独立性的崛起。此外，表现当时风俗和历史题材的绘画，由于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市民阶层也形成了一定的市场。

宋代都市生活的发展已日趋精致和繁荣化，达到了高度发达的水准，此时的世态风情、生活时尚、服饰饮食、礼仪交往无不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呈现出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风貌，强烈反映出中古时代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为中华民族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的审美文化时尚画卷。

^① 孙昌武：《禅思与诗情》，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 8 月版，第 407 页。

第 4 节

商业革命与城市时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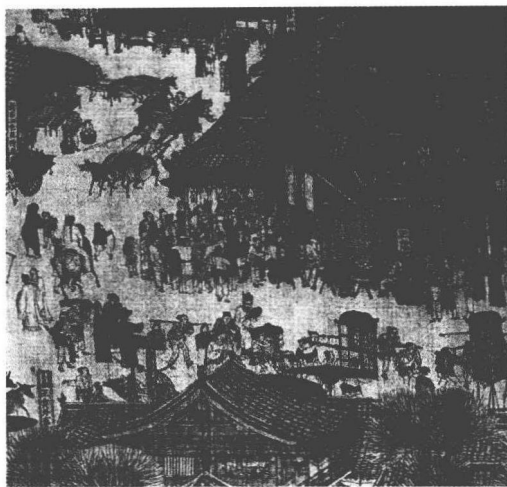
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在经济及制度上是古代向近世中国转折的历史时期。宋代国土日蹙，政治积弱，然而经济迅速成长，市场空前繁荣，拥有较高的生产力，成熟的官僚体系、货币制度和交易系统，贸易极为发达，文化乃至科技之昌盛尤引人注目，识字率在当时也位列全球最高（15%—20%），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将之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上世纪末，中外经济史学家高度评价宋代，在当代世界经济研究中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以迄今为止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用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了估算。根据其计算的结果，无论是作纵向的还是横向的比较，宋代在世界经济史上都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地位。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外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中和从不同的方面，都得出了“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而后发展减缓，最后限于停滞”的结论。这个结论已成为现今学坛上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主流观点，而此观点的主要基石之一，就是宋代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进步，即“宋代经济革命”。^①

早在 1957 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就对宋代的物质文明有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到了文艺复兴，欧洲就走在前面了。但起初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很小，直到 18 世纪还是处于一种雁行状态。但是工业

^①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第 177—192 页。

革命一发生，欧洲便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①郝延平在其《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中即认为宋代处于世界史上第一个商业跨洋大发展的时期，与东北亚、南洋、中东皆有贸易，是东方商业的扩张时期，并直接刺激了欧洲近代商业革命的兴起，迈向“全球市场”。^②可见此时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都经历一大变革，学者将宋代视为中国正式从中古转向近代的开端。近代化的定义一般包括商业化、都市化、经济自由化等因素。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城市的商业已形成了庞大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点到面的结合形成的，点是深入都市的坊巷和遍布全城的各种商肆，面即是铺店林立、位于全城的中心地区的商业区。北宋东京开封府的规模虽不及唐代的长安，但仍然是11至12世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坊市制”，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已日渐崩溃，屡遭破坏，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更多的贸易自由，那种不受时间和区域限制的商业活动在宋代出现了。在地域上不仅在城里可以设立商铺，就连城郊和乡镇也有了草市；时间上，商铺的营业时间完全由店主决定，正常情况下是天明开张，日落闭铺。“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街巷的市民有时家里也不再置办蔬菜，中、晚饭往往到“市店旋买饮食”。至于酒肆瓦市等则“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

由于开封地处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和金水河的交汇处，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一带的物质可以很方便地运抵京都，从而使开封处于

① 宫崎市定：《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鉄》，刊于《东方学》第13辑（1957年）。

② 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收录于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书（40），2004〕，第14页。

“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有利地位。开封既是商贾会聚之所，又是人文荟萃之地，“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茶坊酒肆内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按管调弦，杯觥交错，一番歌舞升平，其菜肴可谓是“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逛夜市是宋代的一种消费时尚，历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下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甚至在风雪交加的大冬天，夜市也照常开张。“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焦酸馐、猪胰、胡饼、和菜饼、糍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①北宋东京的夜市相比其他地区更为热闹，如马行街，长达数十里的街巷，两边遍布铺席商店，其中还夹杂着官员宅舍，形成了坊巷市肆有机结合的新格局，尤其是这里的夜市，比东京著名的“州桥夜市”景象更加美观，达到“车马阗拥，不可驻足”的程度，灯火通明，热闹繁华甚至连北宋大文豪苏轼都流连忘返，“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夜市里小吃也很受欢迎，对后世影响极大。据考证，如今风靡于开封鼓楼夜市的火烧、馓子、炒凉粉、羊肉盒、灌汤包子、烤鸭、糖醋熘鱼，即是当年东京市场上的胡饼、环饼、汤饼、凉饼、肉饼、灌汤馒头、卤鸡、鱼演变而来。此外还有《东京梦华录》中有文字记载的烧、扒、煨、烤、煎、炒、烹、炸、蒸、熬、滑、涮、糟、酱、炙等29种热菜烹调技艺。

北宋的夜市没有等级和身份的差别，无论你出于什么缘故，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只要你需要，手中又有钱，都可以在夜市里找到适合自己情趣和嗜好的消遣方式，这也是北宋城镇夜市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南宋时的都城临安，同样也是四方商旅云集，天下诸货交汇，商业发达，买卖生意昼夜不绝。来自海外的各色奇珍异宝、日用品和香料等物，都可以在这儿买到。临安的店铺，一般都沿街而开，形成了几大商业区。自和宁门杈子外，一直到朝天门外的清河坊，南到南瓦子北面，谓为“界北”。中瓦子前的这一片，称作“五花儿中心”。这两块地是当时比较集中的商业区，其他还有几个较为集中的专业街区，如从五间楼一直向北到官巷南街，是当时经营钱钞兑换和结算的地方，在店铺的前面摆满

^①（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7月版，第312—313页。

了金银器皿及可以随时供商人兑换的现钱，称为“看垛钱”；从融和坊北，至市南坊，叫做“珠子市”，在这里都是做大生意的店铺，“如遇买卖，动以万数”。还有富豪们开的质库，即当铺，在城内城外有不下数十处，生意也是十分的红火，“收解以千万计”。

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铺席》的记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盖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即与外郡不同。所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至于故楮羽毛，皆有铺席发客，其他铺可知矣。其余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知其数。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鲑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其他还有名声非常响亮的个体店铺，“如中瓦前皂儿水，杂货场前甘豆汤、戈家蜜枣儿，官巷口光家羹，大瓦子水果子，寿慈宫前熟肉，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涌金门灌肺，中瓦前职家羊饭、彭家油靴，南瓦子宣家台衣、张家元子，候潮门顾四笛，大瓦子邱家笔簪”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店家的存在，为杭城老百姓的生活提供了极大方便。临安的饮食业包括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也效仿北宋东京开封府的风尚，有早市和夜市。

酒楼作为城市时尚的地标建筑，自然是城市商业的先驱。日本中国经济史权威学者加藤繁博士在其论文《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这样形容：宋代城市中的酒楼“都是朝着大街，建筑着堂堂的重叠的高楼”，“这些情形都是在宋代才开始出现的”。在宋代以前的城市里，高高的酒楼供市民饮酒作乐的场所是不可以想象的，这种具有平民文化色彩的经济场所也只有在较为宽松的政策和环境下才能兴起。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东京拥有大酒楼72个，其中白矾楼最为显赫，“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这些酒楼不仅仅是内部装饰雍荣华贵，而且也逐渐趋向园林庭院化，“廊庑掩映，排列小阁



苏汉臣《杂技戏孩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李嵩《货郎图》局部

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使人一迈进酒楼就恍惚到了私家园林，酒楼园林风格化是宋代城市发展的另一特征。市民无不向往在这样的酒楼饮酒作乐，修竹夹牖，芳林匝阶，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优美的园林环境，加之周到细致的服务，无不使人流连忘返。就连位居高位的达官

贵人和皇亲国戚也喜欢到市井中的酒楼饮酒，如大臣鲁肃公就经常穿着便装，不带侍从，偷偷到南仁和酒楼饮酒。皇帝获悉此事，大加责怪：“为什么要私自入酒楼？”他却振振有词说道：“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

城市里酒楼林立，绣旗相招，展现出一番新兴气象，其内部装潢也极尽奢华，“雕檐映日，画栋飞云。碧阑干低接轩窗，翠帘幕高悬户牖”。南宋临安城内的三园楼同样如此：“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但此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一二十步，分南北两廊，皆济楚阁儿，稳便坐席，向晚灯烛莹煌，上下相照，浓装妓女数十，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在“设法卖酒”的掩盖下，由官方经营的酒楼里一般均拥有一批侑酒的官妓，往往引得那些“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①由官妓侑酒确实为商家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许多民营酒肆看到这种情景也纷纷效仿起来。宋代有一种娼妓酒肆，叫做“奄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这种做法加快了饮食业朝色情业发展的步伐。

在宋代，这种酒店一般是在门首的红栀子灯上加盖簪笠以作标记的，“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买欢，则多往其居”。^②如此美观美色，

①（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〇，《学海类编》，民国九年（1920）上海涵芬楼影印，第70页。

②（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5页。